

邢向东 主编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邢向东 主编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邢向东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ISBN 7-5004-4506-7

I . 西… II . 邢… III . ①西北方言 - 研究 ②风俗习惯 - 研究 - 西北地区 IV . ①H172.2 ②K89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650 号

责任编辑 樊夫 李 乔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西北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和民俗资源。历史上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语“通语”的基础方言，它在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陕北晋语保留了许多古老的语言特点，是晋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西北是中华各民族接触、融合的大舞台，在这里，汉语和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曾经或正在进行密切地接触，这种接触造成了复杂多样的语言现象和民俗事象，积淀了丰厚的语言、民俗文化内涵，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民俗文化景观。因此，西北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方言学、民俗学的一块“风水宝地”，近年来更是引起了语言学、民俗学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北地区的语言学、民俗学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连续将西北语言研究和西部地区语言生活调查作为重点课题，就是最好的体现。面对如此难得的机遇，作为西北地区的语言学、民俗学工作者，我们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师范大学于2002年4月12日成立了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这是陕西师大语言学、民俗学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进一步发扬，既体现了陕西师范大学为语言学、民俗学研究作出贡献的决心和实力，也反映了西北地区语言和民俗工作者的强烈责任感。语言学界对研究中心抱有厚望。侯精一、张振兴、戴庆厦、鲁国尧、李如龙、马庆株、徐悉艰、蔡

镜浩、周磊、齐沪扬等先生出席了中心成立仪式，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指导意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心扎实工作，开拓视野，团结西北地区的方言、民俗工作者，积极联络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形成群体优势，提升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在全国的地位。

这本《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就是中心成立以来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收入《论丛》的 22 篇论文全部是未发表的新作。其中既有对方言、民俗的独立考察，也有将两者相结合的探讨；既有共时的描写，又有历时的比较。《论丛》的作者中，既有知名语言学家，又有中青年学者；既有本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又有海内外的专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出版论文集这样一种方式，一方面展示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发挥中心的团结、辐射作用。从论题范围和作者面之广，我们看到了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实力和希望。当然，出版《论丛》还仅仅是个起步，随着西北方言、民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今后我们将努力组织研究力量，拓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奉献出内容更丰富、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来。

在《论丛》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对关心和支持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各位语言学家，对慷慨赐稿的各位作者，对热心扶持语言学事业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陕西师大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

二〇〇三年九月

目 录

前言	(1)
陕西民俗与方言本字	刘勋宁 (1)
唐代洛阳诗人用韵续考	胡安顺 (10)
方言研究与方言视图的数字化	张维佳 (89)
陕北晋语沿河方言体貌范畴的比较研究	邢向东 (110)
新疆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	刘俐李 (142)
陕西镇安云镇客伙话音系	郭沈青 (164)
陕西凤翔方言的语音特点	王军虎 (184)
表音字词头探源	张 崇 (189)
陕西方言书证	郭芹纳 (205)
“儿女子”辨	党怀兴 (219)
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疏证三则	黑维强 (223)
商州方言的“圪”类字、合音词和分音词	张成材 (240)
西安方言中的“把 N — V”结构	兰宾汉 (251)
岐山话人称代词的数与格	韩宝育 (255)
西北方言持续标记浅谈	罗自群 (266)
甘宁青方言“着”字新探	王 穗 王晓煜 王 森 (281)
户县方言的“得”字	孙立新 (294)
榆林等方言中的祈使语气词“嗲”	张 军 (304)

- 安康方言的人称代词 周政 (318)
红遍中华的枣文化 宁锐 (325)
陕北民歌与陕北方言 刘育林 常炜炜 (337)
“山曲”、“爬山调”和“信天游”的
共性研究 李雄飞 (350)
论芭比娃娃与布娃娃的文化意蕴 张志春 (365)

陕西民俗与方言本字

刘勤宁

陕西师范大学成立西北方言民俗与研究中心，这是令人高兴的事。三秦宝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关西民风古朴义气，也是遐迩闻名的。追根溯源，华夏文化的许多基因要到那里去寻找；礼失而求诸野，古代文物制度的理解也要从那里开始。所以，民俗和方言结合起来，正反映了主事者的眼光和魄力。向东兄和我约稿，乡梓之情，我无法推却，而且我的研究工作得益于陕西方言者甚多，我也应该有一篇文章，向父老乡亲表示我的谢意。于是不辞命题作文之难，草就此篇，献上我的一瓣心香。

一 糜

现代字典给“糜”字的注音是 *mi*。如《现代汉语词典》：“糜 *mi*，〈书〉系住：羁～。”这个音来自《广韵》平声支韵靡为切：“糜，繁也。”这个字在《集韵》里又收在去声寘韵：“糜，糜寄切。羁縲也。”

从现代方言来看，这个字读去声。《延川县方言志》（张崇著，语文出版社 1990）有“糜牲灵”一词，注释：“一种放牧方法：用长绳子将牲畜拴好，使其只能在限定范围内吃草或活动。”延川话上、去声不分，统读高降调。清涧话分上、去声，

此字正读去声。原书作者没有分辨“縻”和“拴”的区别。“縻”是一种特殊的方法。縻绳的一头绑在一个橛子上。好一点的橛子头上还有个环，绳子绑在环上。放牧牲口的时候，橛子楔在地里。“縻”和“拴”的区别在于“拴”是用于固定的，“縻”是用于牵制的。比如把牲口拴在树上，牲口会随着低头吃草，绕树打转，绳子会越绕越短，搞不好会把头绕到树上去。而“縻”则随着牲口运动，绳头转动，绳子绕不到橛子上，牲口可以在划定的范围里自由活动。之所以带縻绳放牧，主要是主人同时还要做其他事情，在人离开后，牲口既不会走失，也不会失去自由。

这个词在山东、安徽都存在，也都是读去声。《银川方言词典》也收了这个字，还特别指出是去声。《汉语方言大词典》收有湖北广济“縻牛”一词，也是读去声。因此，《集韵》所记是准确的。

那么，发掘这个字音和字义有什么意义呢？下面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三联书店1994年版）里关于“羁縻政权”的一段话（第89页）：“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与抚慰。”现代书面上只留下“羁縻”一词，书面语和口语脱节，没有人知道“縻”的本来意义。葛先生又显然把“縻”和“糜”混同（这两个字似乎比较容易混同，《太原方言词典》就把农作物名称“糜子”印成了“糜子”），才做了这样的解释。现在有了口语的实际用例，我们就知道“羁縻”是两个近义词的复合，而“縻”也很形象地说明了政权的性质：有一个治所（橛子），有一个活动范围（绳长），在范围里可以自由活动。

二 巍

“巖”现在写作“岩”，人们也把它当大石头看。古代最基本的意义却不是这个意义。《说文》：“巖，岸也。”“岸，水厓而高者。”据此可以知道，“巖”是水边的“高厓”。又《说文》：“厂（hǎn），山石之厓巖，人可居。”“广（yǎn），因厂为屋。”（各本“厂”作“广”，段玉裁改正。）《广韵》上声琰俨二韵均收有“广”字，同注：“因巖为屋。”可见“巖”或作“厂”形，人可居，可以因以为屋。《说文》“厂”下注释：“象形”，“广”下注释：“像对刺高屋之形。”（各本“刺”作“刺”，段玉裁改正。）“巖”的这种意义也可以从文献中体会出来。《庄子·让王》：“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巖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百里子与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嵚巖，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楚辞·七谏哀命》：“处玄舍之幽门兮，穴巖石而窟伏。”这些都反映的是“巖”的本义。又有比喻用法：《战国策·齐六》：“左右顾无人，巖下有贯珠者，襄王呼而问之曰：女闻吾言乎？”（巖下，即廊下。）《汉书·董仲舒传》：“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巖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晋灼注：“堂边庑，巖郎，谓严峻之郎也。”（郎，即廊字。这里的“巖郎”是并列构词，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理解为“堂边庑”也嫌太实。）

清涧县以产石板闻名（谚云：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河道两旁俱是整齐的层状岩。（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呈碧青色。清涧城建于宋代，初名青涧，即得名于此。写成“清涧”是明代以后的事。）尤其是黄河两岸，悬崖高耸。由于水流的常年冲刷，河岸内凹，形成“厂”状。此厂形河岸就叫作“石巖”。石巖于当地人民的生活异常密切。黄河岸

边的人们每年秋天将大枣放入巖中风干，在内歇息也无不可。在动荡的岁月里，人们还要到其中“藏反”（当地话，躲避战乱）。石巖沿着河道延伸开来，恰如长廊一般。

对“巖”字有了这样真切的认识，有些问题就可以澄清了。《世说新语·容止》比喻裴楷、王戎“双眸闪闪若巖下电”、“眼烂烂如巖下电”，如果仅理解为岩石，实在不能知道为什么是岩石下面的电。现在可以懂得，明亮的眼光从深邃的眼窝中闪出，正是“巖下电”。（高耸的眉骨和下凹的眼眶构成的正是“厂”形——裴楷、王戎大概就是眼下时髦的深目大眼形。）

1988年我到张家界参加会议，在上山途中经过一个很大的溶洞。旅游指南上标为“洞”，可是在洞边休息的农人告诉我，原来叫“巖”（ngan 阳平）。可惜当时没带纸笔，没有把洞名记下来。后来几次托人询问那个洞的名字，均未果。我估计，广西有名的“七星岩”、“芦笛岩”的名字，大概都是从这里来的。

“巖”是古疑母字，陕西方言一般韵母前有鼻音声母 n。清涧县黄河沿岸都如此读。但是以县城为中心的西半部则读如我国南方方言，声母为 ng，韵母无 i 介音。《集韵》覃韵吾含切有：“巖，山崖也。”记录的应当是这种读音。两种读法的地理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也值得研究。

三 烂

“烂”现在叫“炒面”（最近兴起了炒面条，此“炒面”不是那“炒面”），顾名思义是“炒的面粉”。恰恰错了，古代的“烂”不是炒的面粉，而是炒的米、麦磨成的粉。炒过面粉的人就会知道，受热的面粉会返潮，是很难搅拌的，需要消耗不少油在里面才能炒。

“烂”古代也叫“糗”。《集韵》上声小韵齿绍切：“烂，糗

也。”又上声有韵去久切：“糗，〈说文〉：熬米麦也。”《书·费誓》：“峙乃糗粮。”疏：“郑玄云：糗，捣熬谷也。谓熬米麦使熟，又捣之以为粉也。”制作方法是很清楚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飧饭》：“作粳米糗糒法：取粳米汰洒作饭，曝令燥，捣细磨，粗细作两种折。”《本草纲目拾遗》：“河东人以麦为之，北人以粟为之，东人以粳米为之，炒干饭磨成也。”《齐民要术》里还有“作酸枣麯法”、“作杏李麯法”、“作奈麯法”、“作林檎麯法”，都是将果肉晒干磨粉，与“炒”无关。（参见《中古饮食文化的变迁》，王利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清涧的“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做法。清涧用黏性米炒熟磨成粉，如果炒黏性米是典型做法的话，可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清涧也有用面粉炒成的，但不叫“麯”而叫“茶面”。我小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牛油茶——放入牛油炒的面粉。“茶面”和“麯”的吃法完全两样：茶面是冲汤喝的，麯是拌成块儿吃的，吃法很像藏族的糌粑。二是发音。清涧话区别止摄之外的照二开口和照三开口，“炒”是二等字，不卷舌，相当于北京话的 cao，“麯”是三等字，卷舌，相当于北京话的 chao。当地人说：我们很多字读错了（指卷舌念成不卷舌），惟有“麯”念对了。憨厚之态可掬。其实是北京话把二者混为一谈，陕西话保留着古代音韵的区别。北京人以不知为知，陕西人反以知为不知，哀哉！许多人以为中原官话混淆卷舌非卷舌，其实中原官话也是分别的，只是分的路子与北京话不同而已。

四 紂

“紂”在现代书面语里只用于“紂王”一词。所以人们无法知道“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种不知道并不是从现代才开始。司马迁就不知道“紂王”何以为“紂”。《史记》曰：“帝乙崩，

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纣”在现代口语里还有一个地方使用，这就是放在驴屁股后面尾巴下面的短棍叫“纣棍”。扬雄《方言第九》说：“车纣，自关而东，周洛韩郑汝颍而东谓之畿（鞚），或谓之曲絪，或谓之曲纶，自关而西谓之纣。”可见，“纣”在那个时候是“自关而西”的方言。“自关而西”正是周秦故地，今陕西地面。前鞚后鞚，“纣”和“鞚”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兜在牲畜股上的绳带。我们写下“屁股后面尾巴下面”的字样，人们就会觉得有辱骂之意。即使除去辱骂这一层意思（这也许是现代人才有的），也有“末后”的意思。一个帝王，总是想着“递二世三世而至于万世为君”，不可能把自己叫“末后”。由此我们推测，“纣王”这个名字大概是周灭商后给纣王的谥号。就好像后世失败的帝王都由自己的征服者给予侮辱性的谥号一样，纣王当然不可能在周王朝那里得到什么好的谥号了。商周之际正是“追谥”制度逐步成形的时期（参看屈万里 1945 《谥法滥觞於殷代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大概还没有后代那种比较正式的议谥上表活动，“纣”又不见于书面语，于是司马迁也只能说“天下谓之纣”。有人想把“纣”看成纣王的名字，从上述词义可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史记》最为人称道的事情就是商王的称呼和世系被后来发现的甲骨文所证实。纣王真的名“纣”的话，司马迁可以不知道，但不至于知道有“纣”却不知道那是纣王的“名”。《史记·集解》注：“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集解》认为是“谥号”看来是对的，至于对谥义的解释，大概是根据纣王的罪名附会上去的。因为“谥法”晚出，而且后代也没有谥“纣”的。

依史书记载，谥法起于周人。《礼记·檀弓》：“死谥，周道也。”但据现代考古成果来看，商代末期已经有了“文丁”“武

丁”之称，所谓“文、武”自然是对他文治武功的颂扬，应为死谥的滥觞。初起阶段应该是按照业绩的总体印象或者某种特出之事而言的，并不是全面评价，所以也不像后代那样锱铢必较，溢不胜溢。纣王最大的特点就是“末代皇帝”，正好是“纣”。如果我们的看法是确实的，那么“纣”就是中国历史上恶谥之始。

就陕西话而言，音韵上也有值得申说的特点。“纣”是古代的浊声母字。陕西存在着浊声母变送气不送气两派。绥德以北，浊声母变不送气，这个字应当读同“咒”。我曾经问过黄河对岸不送气地区的“纣棍”的发音，得到的正是“咒”的发音。不知道绥德以北如何。（黑维强兄来电相告：绥德谚云：驴乏了怨纣棍。“纣”正读不送气音。绥德以北的子洲、米脂、横山、佳县、神木等地都读不送气音。）清涧、延川一带变送气，这样“纣”就读同“臭”。所以人们也许会误解为“臭”——牛后为臭。关中一带的演变规律同北京话，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但是从现在星星点点暴露出来的字来看，底层也仿佛是变送气的（如“族、造、撞”等字）。这样“纣”字正好可以作一个鉴定字，看看关中地区原来读送气还是读不送气。

五 一些语言学的话

以上说的这几个字，都是现代书面语里不能单独使用的字。字单独使用的时候，字和字之间的对立是直接的（最小对立），字音和意义的界限都是清楚的。如果不能单独使用，字和字的对立就变成间接的了。意义就会模糊，发音也会变化（由于连读、轻读、同化、异化等原因。）上面说的这几个字都是由于现代书面语里不能单独使用而意义模糊起来的。光靠书面语的排比，并不一定能看出它的确切用法以及它的正确读音。

据《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统计,“巖”在《世说新语》里共出现 12 次。该词典把这些用法分归两个义项:(1)高峻陡峭的山峰。(2)高。其中“巖穴”出现 1 次,注释为:巖洞;山洞。统计在第一个义项下。引例是《言语》第 22 条:“求英奇於仄陋,采贤儔於巖穴。”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巖”就是《说文》的“人可居”的“巖”。“巖”和“穴”是近义词复合,不能用“山峰”去解释。即使是第 1 个义项的“高峻陡峭的山峰”的“巖”,也只能是苏轼说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巖”,也就是《说文》的“山石之厓巖”的“巖”。《世说新语》的“千巖竞秀”不是跟“万壑争流”相对吗?厂形的“巖”是“山石之厓巖”的特指化,“高峻陡峭的山峰”是“山石之厓巖”的泛指化。至于解释作第 2 个义项的“高”的“巖”,也与此有关,《世说新语》的一个例子就是“巖巖清峙,壁立万仞”。因壁立,才有“巖巖”之貌。所以,《说文》的“山石之厓巖”始终是一个意义引申的出发点。

一般词典都把“糜”的声调注为阳平,其实去声是最基本的。早于《广韵》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在支韵下有“糜,麋爵。亦作絴或牛轡”。在去声真韵有:“糜,麋寄反。”平声是复合词里的音,而去声是基本的,所以去声才不要释义。《广韵》把“糜”只收在平声支韵,整条注释为:“繫也。又麋爵。《易》作靡。”去声不收此字。可见到《广韵》的时候,“糜”的口语用法已不为人所知,都归到了平声的下面。《集韵》支韵的解释是:“糜,說文:牛轡也。一曰繫也。或作絴,亦书作絴。”去声真韵的解释是:“糜,麋寄切。羈縲也。”平声都是对书面语的解释,去声才是独立的训释。今天方言口语表现出来的似乎都是去声,看来是所从来有目的。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紂棍”:“系在驴马等尾下的横木,两端用绳子连着鞍子,防止鞍子往前滑。”“两端用绳子连着鞍

子，防止鞍子往前滑”是不对的。我多次见过驴带纣棍，却没见过一次纣棍连着鞍子。因为只有远途骑人的时候，才会给牲口备鞍，而远途骑人的时候少见，干活的时候多见；干活的时候十有八九带着纣棍。王筠《说文释例》：“今语马用繮，驴羸用纣，纣加横木为其肩狭于马也。”王筠所说略胜一筹，但似乎也未中的。（我以为是着力用的。）究竟如何，需要请教行家。

以上说明，方言里的单音词调查是多么重要。而且这种调查应当和民俗的详细考察结合起来。陕西北部有地处高原的北方话最古老的语言形态——陕北方言，中部有长期是中国文化重心所在的关中盆地，南部有官话影响下兴起的西南官话，层层叠叠，靡巖麌纣，不知留下了多少语言和文化的积淀。近年来陕西省为破译中国文化之谜贡献了不少地下国宝，我相信，陕西省还会为破译中国文化之谜贡献出民俗之宝、方言之宝。我寄希望于陕西师大的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

附记：文章写成后曾送几位朋友把关，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日本筑波大学）

唐代洛阳诗人用韵续考

胡安顺

提要 唐代洛阳诗人的用韵对于考察《切韵》一书是否以隋唐洛阳音作为语音基础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拙作《唐代洛阳诗人用韵考》一文的基础上对初唐至盛唐洛阳诗人的用韵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增加了盛唐诗人刘禹锡的用韵材料，并对刘禹锡与张说、祖咏、孙狄、刘方平、贾至等人的用韵特点进行了比较。结论是：（1）张说等五人用韵中所反映出来的韵部多数比《切韵》的韵部大，唐代洛阳音的韵部与《切韵》的韵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刘禹锡的用韵特点与张说五人的用韵特点基本相同，可证刘禹锡确系洛阳人；（3）刘禹锡用韵中反映出来的韵部亦比《切韵》的韵部大，这再次说明把《切韵》所依据的语音基础看作洛阳音的根据是不充分的。隋唐时期洛阳音的韵部不仅多数大于《切韵》的分部，也有不少大于《广韵》中的同用规定。它大体上同于吕静、阳休之、夏侯咏、杜台卿、李季节等人所著韵书中后来被《切韵》作者分开的韵部。

关键词 唐代 洛阳诗人 用韵 续考 《切韵》

唐代洛阳诗人的用韵对于考察唐代洛阳音的韵部及《切韵》一书是否以隋唐洛阳方言作为语音基础来说非常重要。笔者在